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3.002

■ 毛泽东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 理论和实践探索^①

吴毅君, 张志兵, 韩平

(湖南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湖南科技大学基地,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延安时期, 针对战争环境和边区实际, 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实行民主、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理论, 并通过推行民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扶贫济困等实践举措, 改善了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考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生理论和实践探索, 充分认识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保证、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石和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 这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 延安时期; 民生问题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3-0007-05

Mao Zedong's Theory and Practice on Livelihood Issues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WU Yi-jun, ZHANG Zhi-bing & HAN 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Base,

Hunan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of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based on the actual reality of the warfare and the border area, Mao Zedong propos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ies on solving the livelihood issues by developing democracy, economy,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etc. Mao Zedong also proposed practic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arrying out democracy, developing production, setting up education undertakings, and helping the poor, which had solved the most direct and the most realistic interest that common people we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Inspecting Mao Zedong's theory and practice on livelihood issues during this period,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at democracy is the guarantee, development is the premise, and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to solve the livelihood issues, and social security is a basic system to protect people's life and regulate social distribution. It is of importantly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currently overall social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the focus o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Key words: Mao Zedong; Yan'an period; livelihood issues

① 收稿日期:2014-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生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研究”(09BDJ015)

作者简介:吴毅君(1964-),男,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何为民生?就是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追溯党的历史可知,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领导边区政府和军民开展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回顾、总结和领悟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对于今天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推行民主,保障人民基本权利

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并积极推行民主,把民主与当时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抗日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阶段,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了民主即是抗日”^{[1]274}，“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并要求“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2]130}。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民主选举,让群众选举“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并且办得好,这比旧的派官制度要好得多。民主选举、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是这一时期践行毛泽东“民主”原则,调动各方积极性,保障人民权利的最成功的民生实践。

1. 推行民主选举。毛泽东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3]103} 正所谓:“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为保障边区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1937年拟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定了“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4]160}。条例中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不分阶级”,但规定了无“财产”的区别,并明确边区各级代表、议员都是选举产生的;条例还规定所有选民所享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都是一样的,效力相等。在实践操作中,边区政府还根据现实需要,对具体的选举形式和方法不断进行总结和完善,在充分实现民众选举权利的同时,不断提高选举的平等性和科学性,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拥护。正如,老百姓歌谣所传唱的“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苦其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压我们”(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5日,第2版)。

2. 实行参议会制度。参议会制度,是具有边区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边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边区人民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各级参议会,参与管理边区事务。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2]102} 这就明确了参议会制度是人民享有真正民主权利的代表会议制,是边区人民依法享有民主管理和监督及人民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的制度保障。延安时期边区普遍实行的参议会制度,不仅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具体实践,也为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3. 制定“三三制”。领导抗日、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旧有地方精英的参与,“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5]765}。毛泽东首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中提出实行“三三制”,他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6]750} 在人员的组成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6]750} 当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6]742}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1941年4月,邓小平就“三三制”进一步作出说明,他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7]9} 实行“三三制”政权,“既能合乎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够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7]8} 实

行“三三制”,不仅调动了边区各阶层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大大加强了边区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正如国际友人所评说的,当时的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

二 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社会负担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467}。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争取实现民众的民主自由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实现解放。改善民众生活也就成为毛泽东解决边区民生问题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1. 领导“大生产”运动。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农业生产凋敝,商业活动疲乏。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必须改变现有政策,花大气力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增加生产,“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2]467}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39年1月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为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而努力奋斗。1941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边区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重大工作,但只要没有发生大的突变,“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8]187}在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农业为主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并且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到1943年,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计约60万元,其中64%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

2. 实施“精兵简政”运动。1941年11月,李鼎铭等11人针对边区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并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毛泽东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后,认为这是一剂“对症药”。随即,中共中央发出了指示,要求各地“为进行长期的斗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据史料记载,1941年12月到1944年1月间,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9]148},政府系统人员由11500人减至7500人,减幅达到35%。通过“精兵简政”,边区人民的负担大幅降低,受损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得到了有效修补。群众在根本利益得到保障后,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高涨,边区生产很快得到发展。

3.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就处理好了中国最基本的阶级关系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即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260}1937年,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提出“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即在原来租额的基础上减25%后向地主交租。194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规定地主要普遍减租减息,同时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新的土地政策,既调动了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联合了大多数地主;恰当地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与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农民不仅得到了实惠,而且增强了政治优势。据统计,到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了1425.6万亩,较1937年几乎翻了一番。粮食产量1941年达到自给有余,1945年则基本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

4. 推行“公私兼顾”方针。边区有限的经济能力,使得军民出现争利现象,造成了军民之间隔阂。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认为造成军民交困的重要原因没有很好地发展工商业,以致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也不能供给。针对这种情况,他要求边区“首先要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9]176},以民营经济解决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以公营解决党政军的生活事业支出,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民兼顾”和“民营为主,

公营为辅”的方针,边区政府逐步发展了工商业,活跃了经济,调动了军队和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至1944年,延安私营商户达到473户,较1936年增加了285%,其中,资本5万元的商户增加了15倍。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边区军民不懈努力下,边区基本上建立起了水准不高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繁荣了商品市场,保证了物资流通和供给,稳定了物价。

三 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8]177}。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实施国民教育、进行文化建设对于繁荣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10]110},并且指出“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伟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10]120}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明确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边区普及国民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正是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边区的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1. 发展国民教育。由于地域封闭、经济落后,95%以上的陕甘宁边区群众都是文盲,社会上大量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普及国民教育,是边区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边区政府1937年发布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第2版)。当时,边区的小学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私塾式的学校,二是民国时期开办的比较正规的学校,三是边区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办的新式学校。中等教育,1937年以前仅有延安一所省立第四中学^{[11]141}。随后,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边区中学、农业学校,到1941年,边区中学发展到了11所。建构较为完整的小中学教育,不仅提高了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而且为边区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毕业及未毕业的干部约3000余人^{[12]26}。

2. 重视干部教育。毛泽东在延安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11]277}“因此,有计划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6]526}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下,边区先后办起了50余所干部学校,开展高级、初中级和在职干部教育,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各方面的人才。与此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干部作风教育,注重加强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他强调:党的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522}并严肃地指出,干部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都是最可鄙的;干部应当学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正是好的干部作风,带动了延安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3. 支持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延安时期,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抗击日寇、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落实毛泽东关于“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指示精神,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337}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1年,边区成立民族学院,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此外,边区政府帮助回族、蒙古族同胞建立伊斯兰教学校、蒙族学校,开设阿拉伯文、蒙文等专门教育,教习科学知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时,还培养立志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延安时期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融洽了民族关系,有力增进了社会和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延安时期,由于地理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剥削严重,加之战争环境的影响,边区出现大量弱势群体,社会问题突出。大量难民的流入,烟毒、赌毒的泛滥,封建旧俗的盛行,使得边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形势严峻,任务繁重。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边区成立专门社会保障机构,颁布法律条文,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1. 组织救助难民。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边区的难民问题十分突出,每天都有大量难民流入。自1937年至1940年,“从山西、绥远以及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13]¹²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要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入手,先稳定难民,再图生活、生产。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救济各地遭灾灾民的紧急措施》等文件,通过帮助难民自谋生路、创办难民工厂、鼓励难民垦荒、组织群众互助等措施,促进难民工作的开展和边区农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开展移民工作,改变边区内部人口、劳动力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人口有序流动。

2. 广泛开展社会保障。在毛泽东的主张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探索性地开展了边区社会保障工作,以稳定抗战的总后方,承担起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试验区”的责任。边区的社会保障在内容上包括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四个方面,在对象上涵括了工、农、兵、学和公务人员等各个方面。但这种社会保障水平是很低的,仅仅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例如,1940年,对于抗日军人的抚恤金标准:牺牲者20元,一等残废者30元,二等残废20元,三等残废12元。同时,边区的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力量和民众的互助。虽然边区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准的基本全覆盖体系,但却有效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改变了民众的思想观念,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稳定了社会秩序。

总之,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辉煌而重要的时期,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生理论,并进行了伟大实践,为夺取全国胜利并在全面进行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认识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保证,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石,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据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4]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1] 阎树声.毛泽东与延安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12]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中、下篇)[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 [13]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